

学林

早期欧洲的 Sinology 不是“汉学”而是“中国学”

沈卫荣

欧洲早期的“汉学”与我们今天理解的主要以研究汉语文献和历史为主体的狭义的“汉学”有很大的不同，它是研究中国古代各种民族语文献和历史文化的“中国学”。

西方 Sinology 形成于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是那个时代欧洲蓬勃兴起的“民族语文学”的一种。“民族语文学”研究的是一个民族的语文和历史，如“日耳曼语文学”(Germanistik)研究的是德意志民族的语文和历史。然而，西方 Sinology 诞生的时代与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同步，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汉族统治下的传统中国，而是满族统治的大清帝国，后者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所以，西方 Sinology 是以清代中国诸多民族语文的文献、历史和文化为研究对象，它不是狭义的“汉学”，而是“中国学”。于早期西方学界，“汉学”这个名称并不常用，更常用的是“中国学”(Chinakunde, Chinaforschung, Chinawissenschaft)。“东亚研究”(Ostasienforschung)、“东方语言”(Orientalische Sprache)等名称，有时还直接用“东方学”(Orientalistik, Morgenlaendische Forschung)来指称“汉学”。

于此，我们可通过对法国和德国早期“汉学”史的回顾，来说明欧洲早期的“汉学”不是狭义的汉学，而是结合了“汉学”和“虏学”的“中国学”。

法国最早的“汉学”教席是 1814 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的“汉语、鞑靼-满语语言和文献教席”，他的第一位拥有者是法国最早的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除了汉语之外，雷慕沙还研究蒙古语、满语、藏语和其他多种东亚语言。法国早期的汉学大家没有一位是纯粹的、狭义的“汉学”家，而都是兼通多种中国民族语文的大家。雷慕沙的接班人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本来是一位古典语文学家，对希腊语、闪含语有很深的研究，后来专心于中国的小说、戏曲、科技史和道教、佛教资料等。傅斯年曾称国人的“四裔之学”比不上“玉莲之解《大唐西域记》”，因为《大唐西域记》中有大量非汉语的词汇，和非汉族之宗教与文化的丰富内容，若非兼通汉语之外的多种欧亚语文，则绝无可能准确地解读《大唐西域记》，所以，儒莲一定也是一位兼通“虏学”的“中国学家”。同样，雷慕沙之后另一位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所译《史记》之《外国传》的水准，远超国人丁谦的《诸史外国传考证》，其原因也是因为沙畹兼通多种欧亚民

族语言。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从来不是汉学教授，而是法兰西学院的“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学”讲席教授。“他有能力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达到了对早期汉语文献的完全理解，这些文献都程度不等地带上了受亚洲其他高等文化的语言和文献影响的烙印。他不把中国看成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被孤立的文明，而是一种在整个亚洲的语境中形成的文明。”(美国汉学家薛爱华语)伯希和无愧于世界最伟大的汉学家这个头衔，但他的“虏学”成就甚至超越了一名汉学家的成就，他在藏学、蒙古学和中亚学等领域的成就均出类拔萃，是一位将“汉学”和“虏学”完美结合的“中国学家”。伯希和的这份学术遗产，形成了欧洲 Sinology 研究中的一个伟大传统。

藏学、蒙古学等称号尽管很早就出现，但它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欧洲大学等学术机构中建立的时间则相对较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被包括在广义的 Sinology，即“中国学”之中。伯希和之后还有多名法国汉学大家，在藏学、蒙古学和中亚研究上有非常出色的成就。例如，沙畹弟子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最著名的学术著作是对国际藏学和佛学研究的进步有过重大推动意义的《吐蕃僧诤记》，他也是一位兼通“汉学”和“虏学”的“中国学家”。曾师从伯希和的石泰安(Ralf Stein, 1911—1999)是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的汉学教授，但他还是法国最优秀的藏学家、蒙古学家和中亚语文学家。他把藏学置于整个中国学和亚洲文明研究的宏大背景之中，取得了纯粹的藏学家们无法企及的学术成就。他充分发挥身为汉学家的长处，对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做出了精湛研究。将藏学、蒙古学等作为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欧洲学界的一个学术传统。

20 世纪著名西藏学家、意大利东方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 1894—1984)从来没有担任过藏学教授，他最早是那不勒斯大学远东学院的汉语讲席教授，后来是罗马大学印度和远东之哲学和宗教学教授。图齐早年曾专注于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翻译过《孟子》等汉语文献。而图齐之后意大利杰出的藏学家伯戴克(Luciano Petech, 1914—2010)在罗马大学的教职是东亚历史教授。



德国波恩大学

这些充分说明欧洲早期的“汉学”其实是“中国学”，它不只是研究汉语文献和历史、文化的学科，而是研究中国各民族语文和历史文化的专门学科。

同样的情况亦见于德国早期汉学史中。被认为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汉学教授乔治·冯·加贝伦茨(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其实是“东亚语言”教授，他于 1878 年被莱比锡大学任命为首任东亚语言特任教授，除了教授汉语外，他也教授藏语、蒙古语和满语等其他中国的民族语文。德国现代最著名的汉学大家是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他先后在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建立起了中国学的教席，他的五卷本《中华帝国史》是那个时代欧洲中国研究的代表作。但是，福兰阁也不是一位纯粹的“汉学家”，他最初是一位从事梵文研究的印度学家，后来才专注于中国研究。他在汉堡大学的教席是“东亚语言和历史”，他曾在柏林大学主持一个阅读清代四体文碑铭的读书班，同时关注汉文、蒙古文、满文和藏文文献的研究。

与伯希和同时代的德国汉学大家海涅什(Erich Haenisch, 1880—1966)，虽然曾在莱比锡、柏林、哥廷根、慕尼黑等大学担任汉学教授，但他更是一位著名的蒙古学家和满学家。他重新翻译、注释了著名蒙古历史著作《蒙古源流》，后来还重构和翻译了蒙古文的《元朝秘史》，编写了蒙古文、满文词典，给德国的中国学研究打上了很深的蒙古学和满学的烙印。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20 世纪德国著名蒙古学家海

西希(Walther Heissig, 1913—2005)原本也是一位汉学家，曾于 1936 年在柏林投归海涅什门下学习汉语和蒙古语。1940 年代，海西希曾在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地区做了多年的学术考察，收集到了大量的蒙古文文献。1950 年代开始，海西希致力于在联邦德国建设一个新的蒙古学学科，将蒙古学与汉学、突厥学、乌拉尔-阿尔泰学、通古斯-满学、藏学和印度学等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多学科互相支撑的学科。1964 年，海西希在波恩大学建立“中亚语言文化研究系”，并将它发展成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从事蒙古学、藏学、突厥学和满学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而战后德国汉学的领军人物傅海博(Herbert Franke, 1914—2011)，也是一位世界著名的中亚学家，是他那个时代世界权威的辽、金、元史专家，也曾为西夏和西藏研究做出特殊贡献，他晚年专门从事元代西夏历史和宗教研究，并在巴伐利亚州科学院主持中亚研究委员会，编写古藏文词源字典。

20 世纪前半叶，德国出现了一批兼治“汉学”和“虏学”的优秀中国学家。傅斯年把德国早期的回鹘文研究专家米勒(Friedrich W. K. Müller, 1863—1930)列为欧洲四大“虏学家”之一，而米勒同样出身汉学，以后才专注于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献的研究。与米勒同样，欧洲现代著名回鹘文研究专家加贝安(Annemarie von Gabain, 1901—1993，亦称葛玛丽)女士，最先也是汉学家，以陆贽之《新语》的德文译注本取得了汉学博士学位，后来专心从事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献研究。

此外，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和“虏学家”还有劳弗尔(Berthold Laufer, 1874—1934)和雷兴(Ferdinand Lessing, 1882—1961)等人。劳弗尔是伯希和式的中国学研究大家，精通许多东亚和中亚民族语文，研究中国和中国西域地区的物质文明史。而雷兴早年曾是北京大学最早的梵文教授，参加过斯文赫定组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他研究汉学、佛学、藏学和蒙古学，均有建树，他的成名作《雍和宫》至今还是藏学、汉学的优秀作品。自 1950 年代开始，雷兴担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汉学教授，将欧洲的汉学语文学传统引入美国大学。雷兴自己后期最主要的学术作品是他编写的蒙古文-英文词典，以及和他的美国弟子艾利克斯·韦曼(Alex Wayman, 1921—2004)一起翻译、注释宗喀巴大师的弟子、第一世班禅喇嘛克主杰所造的一部关于密乘道次第的论著。

不难看出，欧洲早期的“汉学”与我们今天理解的主要以研究汉语文献和历史为主体的狭义的“汉学”有很大的不同，它是研究中国古代各种民族语文文献和历史文化的“中国学”。欧洲早期汉学家们所具备的这种兼擅“汉学”和“虏学”的学术素养，表明欧洲汉学从一开始就具备“中国学”的学术性质。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欧洲三大著名的汉学研究杂志《通报》(T'oung Pao)、《泰东》(Asia Major)和《华裔志》(Monumenta Serica -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其实都不是纯粹的“汉学”研究杂志，而是包罗更广的东方研究和亚洲研究杂志，特别是《华裔志》，更明确地表明它同时是研究“汉学”和“虏学”的杂志，其中的“裔”指的就是与“汉学”相对应的“四裔之学”，于此与“华裔”对应的西文是 Serica，可见后者不是指“汉”。(作者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从父亲的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给父亲的印象仍然是中学时代那个勤奋好学的样子。然而，在波恩大学的第二学期，父亲却收到了马克思在学校参加决斗的消息。

马克思为什么要转学

从波恩大学到柏林大学

高红明

1845 年，在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在此当然并非单纯地论述教育与教育者的关系，而是要从根本上揭露以往唯物主义存在的问题，阐明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根本特点。然而，如果从单纯教育学角度看，马克思在此要批判或否定的是那种抽象或静态的天才论，而同时强调教育行为和学习环境的重要性。马克思也曾被视为“天才”，但这又和马克思的勤奋好学，以及与马克思所处的学习环境等密不可分。

在马克思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遭遇过一次转学的经历，即从波恩大学转到柏林大学。其原因与马克思及家人的意愿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波恩大学校园的学习风气本身，及其对马克思学业和未来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19 世纪 30 年代的欧洲，尽管英国和法国已经率先在生产、思想和政治等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在莱茵河东岸的德国，仍然停留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对反政府激进者的迫害几乎消解了人们对美好大学生活的回忆，凡是知道一点政治思想的人，都秘而不宣。而培养驯服的“庸人”，则是当局实施大学教育的原则。这种原则基本上也被那些感到受禁锢、有时也起来反抗的大学生们顺从式地接受了。在大学生会上，谈论“学术”是很不受欢迎的；于是他们在真正的饮酒晚会上别开生面，当场召集“啤酒之友会议”，对“闹事者”按照情节轻重罚酒。

德国大学教育的这一状况一开始可能并没有影响到在中学时期勤奋好学的马克思。这可以从马克思父亲的来信中看出来，父亲表达了对马克思大学学习和生活的关心和忧虑：

“你的良好愿望、你的勤奋努力，以及你想做那些扎扎实实的事情的坚定志向，我丝毫不怀疑。而现在又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刚开始的学习使你感到满意，也不费劲，并且你对你的专业也产生了兴趣。九门课程，在我看来多了一点，我不希望你学的东西超过你的身体和精力所能承受的限度。”

“亲爱的卡尔，祝你健康，在用丰富而有营养的食物来滋养你的智慧的时候，别忘记，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身体是智慧的永恒伴侣，整个机器的良好状况都取决于它。一个体弱多病的学者是世界上不幸的人。”

然而，当时德国的绝大多数大学，学校领导都会在夜 11 时左右将学生赶出啤酒馆，学生们便通常聚集到广场上。在这里，各个社团或“派别”的成员开始同其他“派别”的成员掀起相互“嘲讽”的竞赛，目的是想挑起一场不太危险的决斗。这种牛角尖角十分流行，主要技巧在于嘲笑得体，不加正式或公开的辱骂，但同时又能尽可能地激怒对方，使他最后失去冷静，破口大骂，而挑衅者也就不得不向他提出决斗。

从马克思父亲的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给父亲的印象仍然是中学时代那个勤奋好学的样子。然而，在波恩大学的第二学期，父亲却收到了马克思在学校参加决斗的消息。他十分恐慌，并立即写信告诫马克思：

“难道决斗也与哲学密切相关吗？要知道这是对潮流的迁就，甚至是对它的恐惧。而那是谁的潮流呢？绝不是正经人的，可你还是！无论何处人们总是很少前后一贯的。你得设法不让这种爱好，即使不是爱好，也是欲望，在你的心里扎下根。否则，它终究会使你自己和你父母的最好的愿望遭到毁灭的。我相信，一个有理智的人，是能够很容易地、体面地对这一套不予理睬的，让人尊重自己。”

1836 年 6 月 13 日，马克思甚至因夜间酗酒吵嚷被大学法庭判处禁闭一天，16 日执行。

酗酒、决斗等不良行为造成钱财的耗散，及对马克思身体健康和学业前途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迫使马克思转入柏林大学。马克思的父亲在 1836 年 7 月 1 日的信件中写道：“我儿子卡尔·马克思下学期要进柏林大学，继续学习在波恩选修的法律和官房学。这不仅得到我的准许，而且是我的意愿。”

柏林大学是当时德国学风最好的大学，甚至有戏言称，“与柏林大学的学风比起来，德国其他的大学简直是不折不扣的酒馆”。优秀的学风也很快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不再喝酒、决斗和胡闹，而是更加专注于学业。到了柏林以后，马克思断绝了从前的一切交往，偶尔参与社团活动也是勉强的。从马克思父亲 1836 年 11 月 9 日的来信中也可以看出这样的转变，从在波恩大学时担心他喝酒决斗闹事，到又开始担心他在柏林大学过于用功学习而损伤身体：



毕加索 红色圆珠笔绘 马克思 1951 年 资料图片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在学习上不要过于用功，千万要保护好你的体力和你已经很差的视力。你选修了很多门课程——自然，你是有理由勤奋学习的，但不要把你搞得精疲力竭。上帝赐福，来日方长——你将为你自己造福，为你的家庭造福，如果我的预感没有错的话，也将为全人类造福。”

在柏林大学，马克思先后选修了萨维尼教授讲授的罗马法全书，甘斯教授讲授的刑法、普鲁士法，斯蒂芬斯教授讲授的人类学，赫弗特教授讲授的教会法、德国普通民事法、普鲁士民事法、刑事诉讼、布勒教授讲授的逻辑学，李特尔讲授的普通地理学，鲁多夫教授讲授的遗产法、神学博士布·鲍威尔讲授的《以赛亚书》，格佩特博士讲授的欧里庇得斯等课程。这些课程为马克思夯实知识储备、拓展思想视野奠定了重要基础。期间，马克思还接触到定期从事学术交流和讲演的“博士俱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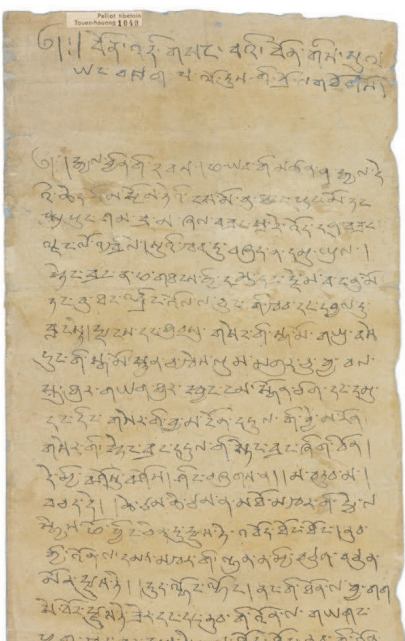
在每周规定的日子里，一些博士和高级学生相约来到法国街上一家不知名的饭店。这种聚会常被在场不相干的客人所扰，他们便决定轮流在俱乐部成员家中集会。在集会上，他们朗诵和评论各自的诗歌和文章，但主要是怀着极大的热情讨论黑格尔哲学。为此，马克思广泛涉猎了自然科学、哲学和历史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并系统阅读了黑格尔的著作，由此也为马克思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杂志创办人爱·梅因回忆说：“最近我认识了一位很能干的青年黑格尔分子——马克思，科本《论弗里德里希大帝》那本书就是题献给他的，他是布鲁诺·鲍威尔的亲密朋友。他能够而且必定还会有所成就。因为他不仅富有才智，而且具有坚强的毅力。”科本非常敬佩马克思，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你是一个思想库，一个工作房，或者按照柏林人的说法，是一个思想巨人。”

1841 年，马克思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柏林大学签发的毕业证书。证书加盖学校公章并有现任校长以及法律系、哲学系现任主任亲笔签名。关于马克思的博士和睿智，《莱茵报》的创始人赫斯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如此描述：“你应该准备去结识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的真正的哲学家。……他把最深刻的哲学的严肃性同机敏的智慧结合起来了。设想一下，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为一人，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而《莱茵报》不久就吸纳马克思并任命其为主编便是证明。

尽管马克思博士毕业后未能如愿成为大学老师，但他创立的科学的、哲学的方法和论却教育和引导着广大工人阶级开展自我解放和解放人类的实践活动，成为指引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教育我们科学地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正确地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积极地把握人类历史未来。然而，作为教育家形象的马克思并非天生的，它与马克思对人类知识孜孜不倦的求索密不可分，也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密不可分。总之，是时代塑造了马克思，同样，马克思也重塑了这个时代。(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文匯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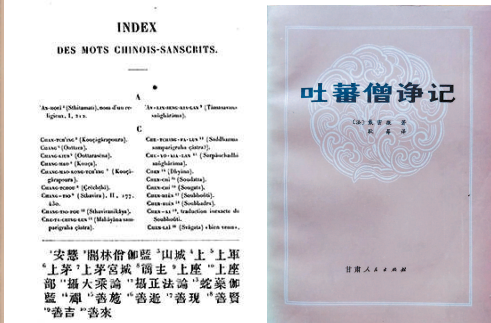
第 606 期



敦煌文献 P.T.1040, 苯教仪轨(藏文)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元·缙丝 须弥山曼陀罗 大都艺术博物馆藏



儒莲在 1857—1858 年间首次译出《大唐西域记》法梵本，图为书尾汉梵索引

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昇译)，对国际藏学和佛学研究的进步有过重大推动作用